

东传科学与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

刘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东传科学与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

刘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刘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5203-3060-2

I. ①东… II. ①刘… III. ①康有为(1858-1927)—经学—思想评论
IV. ①B25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036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湉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4
插 页 2
字 数 331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聊城大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资助项目

前 言

康有为（1858—1927），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经学家、思想家和改革家。在近百年的思想发展史中，康有为所建构的思想体系无疑最为宏大、对后世影响也最为深远。当然，康有为建构的理论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不是铁板一块，无懈可击，其中有真知也有谬误，也一如中国人走过的近百年的风雨沧桑路。康有为作为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他终其一生都对东传科学^①保持着开放、吸纳的态度，并矢志不渝地将东传科学兼容、整合到他所建构的今文经学体系之中。从他一生的学术进路来看，康有为早年泛观博览，钟情西学，兼采汉宋、调停今古，略有古文学的倾向；与廖平“羊城之会”之后遂确立今文经学之立场，并成为其一生思想之基调。

深受恩师粤中大儒朱次琦的影响，康有为经学思想自产生之初便有着极强的“通经致用”特征：侧重“经世”、重视《周礼》、“民功”；转向今文经学之后，更加突出其“经世致用”倾向，关注的焦点从“民功”“物用”层面提到经学理论、政治制度层面的高度。他以学术为本，后逐

^① 注：东传科学是山东大学马来平教授提出的一个专有名词，主要是指第二次西学东渐过程中，传播到中国的西学、西政知识，这里主要侧重于从西方传播进来的自然科学知识。

步落实到制度层面之上，积极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以期推动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康有为从早年崇尚古文经学的治学态度到今文经学立场的转向，从“托古改制”到维新变法，从“三世”进化到“大同”理想，从“物质”与“道德”的并重到以“儒学”为宗并将其奉为圭臬的“普世价值”，其学术思想随着时代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推进、转移和深化。概言之，康有一以贯之的立场在于：“通经致用”的入世精神；“尊儒”“尊孔”及“尊中”的坚定立场；整合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以求中西会通的学术方向都和西方科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密切相关。

清末民初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本书以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为视角，着重考察东传科学对康有为经学立场的转变，在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的嬗变与重建，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探寻科学与儒学的相容性问题以及东传科学影响下儒学对于当代社会以科学为先导的大科学时代儒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基于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建构，当以《实理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和《物质救国论》为主，以及对《中庸注》《论语注》《孟子微》《礼运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诸经典的注解著作贯穿其思想的始终，至《大同书》达到其理论思想的臻美境界。具体内容亦延续至变法的具体措施、大同理想的设计以及物质救国的工业化道路的政治、文化、经济等诸方面。而这些重要思想的建构与对这种理论建构的落实与践行对处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中国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开启了清末民初思想启蒙运动的先声，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对这个时期急剧变化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一源开三流——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就新儒家而言，它的启示在于：现代新儒家和晚年的康有为一样，在道德价值和科学理性之间力求平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蔚为大观。而康有为儒教问题研究也成为中国儒学研究的热点。新儒家以心性之

学为基本取向，向内凸显儒学的思辨性和超越性来安顿人们的心灵和生命，向外则主张返本开新，以内圣开出科学、民主为内容的“新”外王以实现儒家的现代化，所有这些方面都与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新康有为主义”在中国兴起，蔚为大观，一批学者主张“回到康有为”，突出儒学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内容，继续康有为孔教运动的思路，面向社会、建设宗教团体和社会建制以发挥效用，接续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和孔教思想来回应现代性问题，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而这两个方面都导源于康有为倡导的以儒学为“普世价值”的努力。因此，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研究既是老生常谈又是历久弥新的课题。

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产生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近代中国，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向的拐点，也是康有为试图处理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一个极具价值的思考。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对我们如何面对当前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我们处理科学与儒学关系亦有重要启示。探寻康有为今文经学关系问题，对于新儒家缘起、孔教运动的成败以及儒学是否可以成为 21 世纪“普世价值”等问题的探讨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问题分析	(5)
第三节 本书的创新之处及未来努力的方向	(28)
第二章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形成	(35)
第一节 康有为今文经学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	(35)
第二节 东传科学的发展及其对康有为的影响	(52)
第三节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形成	(60)
第四节 康有为“通经致用”为宗的核心思想	(72)
第三章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东传)科学根基	(89)
第一节 康有为进化论思想探析	(89)
第二节 “星云假说”与康有为“以元统天”论的形成	(103)
第三节 康有为的科学方法论思想	(118)

第四章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上)	(126)
第一节 康有为“援西入儒”思想(1880—1894)	(127)
第二节 康有为“以西化儒”思想(1894—1902)	(135)
第三节 古经新解与康有为“以西化儒”思想	(140)
第四节 康有为“以西化儒”思想阶段的科学内容	(154)
第五节 “实理公法”为宗的科学思想	(176)
第五章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下)	(185)
第一节 康有为“儒西并尊”思想(1902—1913)	(186)
第二节 《大同书》的人类理想	(200)
第三节 《物质救国论》体现的物用科学观	(210)
第四节 康有为“以儒化西”思想(1913—1927)	(218)
第五节 康有为儒学宗教化的努力	(225)
第六章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若干问题的讨论	(240)
第一节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与维新思想的形成	(241)
第二节 东传科学与今文经学的整合与会通	(257)
第三节 康有为今文经学与救亡图存的努力	(271)
第四节 科学精神与康有为“六经注我”治经方式的偏离	(292)
第五节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式微	(301)
第六节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瓦解与现代儒学的再出发	(313)
第七节 康有为今文经学与儒学的发展与未来	(330)
结语	(345)
参考文献	(349)
后记	(372)

第一章 导论

清末民初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嬗变问题研究是探讨科学与儒学关系的重要课题之一。涉及东传科学与今文经学关系问题的主要人物是康有为，对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问题进行个案研究具有典型性。本书重在深度挖掘东传之西方科学视域下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的形成及其嬗变等问题，以此窥见康有为援东传科学改造今文经学以求“通经致用”的基本特质。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一 本研究的缘起

在西方科学东传过程中，康有为深知东传之西方科学在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文化等诸领域的优越性，因此，他不断吸纳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知识以建构其独具特色的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在坚守儒家传统思想体系的前提下，康有为踏上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征程。在学术上，康有为鄙弃所谓汉学家烦琐考据的学风，力图开辟“通经致用”为价值指向的治学道路；在政治上，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加速了清朝上国美梦的破产。怀揣着救国救民、复兴中华民族的鸿鹄之志，为避免

革命的流血斗争，康有为力主变法维新以改变清王朝的命运；在实践上，他看到西方的强盛并立志向西方学习，遍读西籍，探求新知，欲以东传之西方科学来挽救濒临危亡的中华民族。康有为深感根植在人们思想中的“理学”传统只重视“修己之学”却忽视“通经致用”的价值指向，而尊“德性”、轻“道问”之学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弊端。于是，他一方面苦读中国儒学经典以求“经世致用”；另一方面遍读西学名篇，渐收东传科学之书，不断涉猎自然科学领域中物理、化学、生物，特别是数学、几何学以及进化论等东传科学知识，在此基础上进行不断地演绎发挥，试图借此重构今文经学，促进了“中学”与“西学”的会通。在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过程中，考察科学（东传科学）与儒学的互动、揭示科学与儒学的关系是本书选题的目标所在。

纵观康有为的一生，有两点不曾改变，即坚持学习东传科学和坚定的“尊孔”“尊中”立场，而康有为一生汲取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养分、以东传科学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今文经学体系是为了挽救国家危亡。本书旨在探讨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思想根源、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特质与定位及其今文经学在东传科学洪流中的时代命运等问题，并试图探究清末民初中西文化激烈碰撞过程给予我们的启示等。康有为试图利用东传科学来重构今文经学，利用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阐发政论的解经方式，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曲解儒家经典。因此，康有为杂糅、牵强附会地利用东传科学来附和今文经学，最后的结局是导致今文经学的式微。康有为此番努力的客观结果虽未达到其主观预期，但是也洞开了思想解放的洪流、开创了新儒家的滥觞。该研究对于当下我国推进儒学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当代正确处理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亦有重要启示。

“东传科学”概念的范围和内容是指明末清初以来西方耶稣会士传播到中国的西方科学知识，既包括西方古代的科学知识又包括中世纪的科学

知识等。^①既有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徐光启、利玛窦翻译的《几何原本》，托勒密的天文学，盖伦的血液循环理论等中世纪的科学知识，也有西方近现代诸如伽利略力学、哥白尼日心说、牛顿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近代的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的东传科学知识。本书论及东传科学的范围，除了西方自然科学之外，还包括西学、西政等西学的知识内容。康有为解经方式为未来儒学与科学关系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不管是研究儒学还是研究科学，都必须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躬行实践、与时俱进，揭示康有为“尊儒”以及对儒学成为“普世价值”预设的重要性。儒家文化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困境的重要力量。中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传统文化正在遭遇着严重的流失，康有为今文经学研究是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康有为问题研究对重拾国民信心，构建国民信仰，发掘儒学文化精髓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 本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本书选择清末民初“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这一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通过对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关系的个案研究与扎实的文本分析，展现了近代东传科学与儒学遭遇的多个侧面，揭示儒学与科学之间的互动机制以及儒学在接受东传科学过程中所呈现的合理因素及其固有缺陷等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为我们在未来挖掘科学与儒学相协调的积极因子，在科学发展的大时代中弘扬儒学优秀传统文化，改造那些不利于现代科学发展的儒学固有的弊端以及促进儒学在现代潮流中朝着更为健康的方向发展等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以康有为为参照，避免我们未来研究科学与儒

^① 杨爱东：《东传科学与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4年，第8页。

学的关系等问题时走更多的弯路，从而把儒学与科学的研究议题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本书旨在探究科学与儒学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研究的重点侧重于深度探究西方科学对康有为儒学体系的影响这一进路，着重考察东传之西方科学在康有为经学立场转变与确立中的积极作用。此一影响，促使康有为为复兴儒学，更加坚定自己利用“通经致用”思想与东传科学重构儒学的努力。纵观康有为的思想脉络，我们可以窥见他本然具有的“经世致用”的特质，康有为通过不断学习吸收、融合东传之西方科学，使他所构建的今文经学思想糅合了更多东传科学的内容，并以此理论支撑确立其今文经学思想体系，所有这些，实际都在他三十岁之前已经初露端倪。本书重点在于论证科学与儒学二者之间相互支撑的关系，探究科学与儒学之间可以并行不悖的发展依据。

康有为是一位儒家修正主义者，他对儒家思想内容的修正和补充有功于儒学，与董仲舒“公羊学”的理路相仿，且再次引领了儒学发展的新方向。康有为将东传科学引入其今文经学体系的意义在于：他的这一理路拓展了儒学“内圣”“外王”之学，开启了康有为“援西入儒”“以西化儒”的先河，更重要的是光大了“经史合一”“经世致用”的传统。可以说康有为在儒学史上是一座绕不过的高峰。诚如董士伟在《康有为评传》中所指出的：康有为肩负着对专制制度的否定以及对于个人权利和实证精神肯定的三大使命。^① 因此，康有为堪称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先锋人物。

作为“今文经学”大师的康有为沿着“董氏公羊学”的理路，勇敢地扛起孔学和经学的大旗并借用东传科学对其改铸，是近代以来将“今文经学”思想发挥到极致的第一人。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与《大同书》等经典之作，以及他对儒家诸经典的阐释标志着

^① 董士伟：《康有为评传》序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南海“康圣人”试图利用“通经致用”重构今文经学理想的可贵探索。尽管这些著作阐释之要义极少具有经学史的价值，但是他的《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物质救国论》以及《日本变政考》等著作对东传科学与今文经学关系的阐释却极具“经世致用”的思想史价值。康有为心悦诚服的先辈，如孟子、荀子、董仲舒、何休等一批名贤大儒，无一例外都是儒家的修正主义者，而不是泥古者，只是他们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都没有康有为来得如此大胆和彻底。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思想史价值。

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问题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社会，科学以一种不可阻挡之势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而儒学作为根植在人们心中最核心的价值理念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源泉。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对于儒学如何吸纳其他文明成果尤其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的菁华来充实和完善儒学自身，对于如何建构一种更为适合儒学与科学的对话机制，如何在科学与儒学研究过程中规避诸如康有为一些主观的做法以及违背科学精神的“六经注我”解经方式的错误做法，以实现二者以一种更恰当、更圆融的方式达到共存、共荣，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问题分析

在清末民初东传科学与今文经学关系问题上，涉及的主要人物有廖平、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但贡献最大的是康有为。以康有为为例，对清末民初东传科学与今文经学关系进行个案研究具有典型性。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关系问题是研究科学与儒学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内有关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研究可谓浩如烟海。陆宝千、顾颉刚、钱

玄同、朱维铮、萧笈父、李泽厚、汪荣祖、朱义禄、樊洪业、汤志钧等知名学者或写专著或撰文从不同的视角评述康有为。另外，还有一批康有为问题专家诸如萧公权、马洪林、何金彝、董士伟、房德邻等也有不少专著问世，形成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研究成果。康有为戊戌变法方面的研究书籍很多，但主要涉及对康有为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大同思想以及他功过是非等问题的研究；站在东传科学的角度，审视东传科学与今文经学关系的研究却少人问津。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对清末民初东传科学与今文经学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纵深的研究非常必要。现把有关康有为今文经学、科学思想方向的研究情况梳理如下。

一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估价问题研究

清末民初康有为把今文经学思想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笔者以康有为为例进行个案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蔚为大观、成绩斐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的诸多问题，此一问题研究持续向纵深方向发展。笔者通过比对整理，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较为肯定的积极评价论；二是近乎否定的消极评价论；三是二者兼有的适度评价论。现对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的研究成果做如下综述。

（一）较为肯定的积极评价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思想较为保守，紧接着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相关研究成果不是很多。一些学者诸如贵州师范大学原校长吴雁南教授以及旅居海外的留美学者萧公权先生、李泽厚教授等人对今文经学研究大多持肯定态度。周予同先生说，“康有为初从同县朱次琦。朱治经，杂糅汉、宋、古、今，不讲家法”。^①正是因为不讲家法，才形成了今文经

^① 周予同：《经今古文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学的内在张力以及寻求出路的发展动力。他早年就是沿着朱次琦的治学理路建构其经学体系，后来随着时势变化并致力于经世之学，大购西书，大讲东传之西方科学，把中国传统学术纳入他的“经世致用”思想与变法维新的轨道。^①

“公羊学”的两个明显特征在于借实际政治来解释儒学以及在学术上不甚求史实的确切来阐发微言大义。今文经学的这些特征就很容易被康有为自由地阐发和随意地利用，并开启了康有为自由解释儒学的大门，使其在对经学的解读上很少顾及历史和传统。萧公权先生评价康有为是儒家的修正主义者，康有为对儒家思想内容的修订和充实有功于儒学，他是继“董氏公羊学”之后，再次沿着此种研究路向发展经学并有功于儒学的人物之一。诚如康有为问题专家萧公权先生断言的：康有为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② 因此，诸如此类的学者对于康有为今文经学持肯定的态度。

李泽厚先生在《论康有为的哲学思想》一文中指出，康有为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关键环节，是近代中国新思潮的代表，深入研究这一哲学体系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历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③ 李泽厚先生称他的哲学思想是一个近代思潮的代表，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近代史，更为深入研究中国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历史和思想史有重要意义。

进入20世纪80年代，相关论题研究开始增多，一批知名学者如顾颉刚、朱维铮、胡维革、汤志钧和房德邻等教授都给予了较为肯定的评价。顾颉刚先生在提到“经今古文”学的源流问题时详细讲到了

① 吴雁南：《“心学”、今文经学与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贵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② [美]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年版，第95页。

③ 李泽厚：《论康有为的哲学思想》，《哲学研究》1957年第1期。

“张三世”“通三世”的概况，以及康有为一生四个阶段的学术流变。康有为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是很有价值的学术史著作。^①

同一时期，朱维铮先生发表了《康有为和朱一新》一文，详细阐发了他们二人对于《新学伪经考》一书展开的论战并做了极具建设性的分析：对康有为而言，他一面发誓要忠于“宋学义理之体”，一面宣称“西学政艺之用”，我们倘若注意到他将西政和西艺混为一用，那么不难看出他的“微言大义”的实际意图。而朱维铮重现了康有为当时试图为自己辩护的所有努力。其实他们二位学者同样担忧提倡西学可能导致过度西化，从而丧失作为传统儒学的立国之体。朱维铮指出康、朱有关《新学伪经考》往返辩难的函件给我们留下了颇有价值的历史记录，也成了唯一留存下来的历史见证。^②同时，胡维革先生也指出，康有为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很长一段时间里，将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相对接并进行调融、重塑和创造，使儒家思想实现现代化，是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③

20世纪90年代，房德邻先生对于康有为利用西方科学改造儒学的评价也极为中肯。他指出，康有为解释儒学的诸多精华是可以为中国近代文化所吸收的，它的整个儒学体系是应该被打破的，而打破这个体系的武器也只有东传之西方科学才能担此重任。在西方科学与儒学的问题上，康有为把东传之西方科学吸纳到儒学体系之中，而实现这种方式的途径依然是在利用东传科学来发明儒学这一维度上做出努力。对于这种努力，其实并不是康有为真正的创造，它实际上只是传统的注经方法。但是，中国古代

① 顾颉刚：《清代“经今文学”与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此文系顾颉刚先生在中山大学的讲课稿。

② 朱维铮：《康有为和朱一新》，《中国文化》1991年第5期。

③ 胡维革：《康有为与儒家思想近代化》，《求是学刊》1992年第3期。